

中医基础理论

肝主疏泄乃“罢极”之本意

200020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潘文奎

主题词 《内经》 肝(中医)

“肝主疏泄”乃近世公认之肝之生理,朱邦贤氏则指出,“疏泄”在《内经》中“只有病理性的内涵”,而《内经》“罢极之本”乃经文肝脏生理之本旨,然历来一直主要诠释为“疲乏劳困之本”。千余年来,何以前者把病理曲解为生理,后者将生理误解为病理,而罕有质疑者,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。笔者从文献学角度对比试作探研,省悟“疏泄”与“罢极”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,肝主疏泄乃罢极之本意。今试就此略述管见,请教于诸公。

“肝者,罢极之本”见于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,与“心者,生之本;肺者,气之本;肾者,封藏之本;脾胃者,仓廪之本”并论,乃是各脏主要生理功能之要旨。然姚止庵曰“罢与疲通,肝主筋,过劳则运用乏竭而困倦矣”,张志聪、程士德、陈梦雷等均宗此说。这种从病理角度之阐述,显然有悖于《内经》之本旨。考“罢极”之词,并非始见于《内经》,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均有此词汇,如《史记·淮阴侯韩信传》曰“今韩重兵号数万,能千里而袭我,亦以罢极”,《汉书·成帝记》曰“百姓罢极,天下匱竭”,均系“罢极谓疲惫已极也”之意,显然姚氏等注释是源于此。但“罢”字,一字有数解。《内经》之“罢极”,乃生理之含意,岂能以“疲惫”之病态诠释?李今庸似悟出此意,以“罢”字当作“能”字训释,“罢极”作“耐受疲劳”之解释,仍未超脱“疲惫”之意,虽冠以“耐受”之词,为病理生理之状态,也并非生理功能之本旨。

《说文》曰:“罢,遣有阜也,从网、能,言有贤能而入网,即贤遣也。”《集韵》云:“罢,一曰散也。”宗此二说,则“罢”当作为“遣散”之意。在《春秋传》、《左传》中均有“布路而罢”之词,亦宗此意。肝遣散之物乃“贤能”之质,实系人体之气血尔,显然这是肝之主要生理功能,此解与经文“肝欲散”、“其政发散”之旨相吻合。“罢”还寓有“网能”之意,故此“遣散”,亦寓“归藏”之旨,故肝之既能藏血,又能调血,则能通解矣。王冰注《内经》“肝藏血”句曰“人动则血运于诸经,人静则血归于肝脏”,实是对“罢”字具体化的阐述。

考“极”字之意,《韵会》曰“方隅之极也”,《荀子·儒效》云“字中六指(上下、四方)谓之极”,《尔雅·释地》则作四方国界解。可见,“极”在医学中可喻为人体身躯体周身。丹波元坚曰“罢极当作四极,四极即四支”,是把“极”作为疆限,在人体当为周身之意。由此可见,“罢极”乃是遣散人体之气血布敷于周身之旨,此解则吻合“罢极”乃肝之生理功能矣。

“疏泄”之词,见于《素问·五藏大论》“土疏泄,苍气达”句。《说文》曰:“疏,通也。”《中文大辞典》谓:“疏者,布也。”陈梦雷在《医部全录》“藏真散于肝”句下注曰:“肝主疏泄,故曰散。”可见,“疏泄”也具有布阵、遣散之意,与“罢极”之含意同义。自朱丹溪在《格致余论·阳有余阴不足论》中提出“司疏泄者,肝也”,“疏泄”始作为肝之生理功能立论。薛立斋则进一

步确立“肝主疏泄”一词,沿用至今。肝主疏泄,关系人体气血之调畅及五脏之生机,故有“肝气通则心气和,肝气滞则心气乏”(《薛氏医案》)、“肺金非木不能生,无木则金无舒发之气”(《石室秘录》)、“木之性主于疏泄,食气入胃,金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”(《血证论》)、“血藏肝中,精涵肾内,若肝气不开,则精不能泄”(《辨证录》)、“木气冲和条达,不致遏郁,则血脉得畅”(《血证论》)等论述。显然,在这些著作中之“疏泄”,皆系肝生理功能之要旨。

诚然,“土疏泄,苍气达”之句,见于肝“发生之纪”肝木过旺之条下,是寓病理之内涵,但实也是《素问·宝命全形篇》“土得木而达”之行文。在这节经文“木得金而伐,火得水而灭,土得木而达,金得火而缺,水得土而绝”句中,“伐”、“灭”、“缺”、“绝”均为相克相乘之病理性损害。然“土得木而达”之“达”字反有资助之意,而无克伐之嫌,诚如《辞源》曰“达,通也,宜也”,《庄子》谓“达,畅也”,由此可理解木与土虽为相克之行,但若张隐庵曰“木得金则伐,(此)为损害也;土得木而达,(此)为制化也”,生克制化乃“造化之机,不可无生,亦不可无制”(张景岳),故仍当隶属于生理状态之中。观肝之机能政用,经云“数和之纪,其政发散;发生之纪,其政散;委和之纪,其用聚”,可见肝以发散为主。《尚书》曰“木曰曲直”,此示肝之刚柔之性,然而曲直之中,肝长于展,诚如傅宗翰所云“根须穿石壁,红杏出墙来”之比喻,也示肝以升发舒展为本。故肝具有“舒展开发”、“疏散宣泄”、“升发透泄”之特性,是为医家所公认的。土也赖肝木之发散而得以疏泄,此并非病理状态之谓也。

肝之疏泄,虽泛指肝气具有舒

中医基础理论

“扶阳抑阴”与“益火消阴”是两种不同治法，然在古今医籍中常将二法概念混为一谈，屡见不鲜。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澄清，遂索检方书，考究原委，试述区别辨析。

一、扶阳抑阴的概念

扶阳抑阴，是指阴寒极盛、阳气相对大衰所致阴寒实证的一种治法。所谓“扶阳”，就是以振奋肾阳为主，兼扶心脾之阳，使之压抑亢盛之阴寒，冀以达到“抑阴”之目的，令阳气回甦，则阴寒自退，故又有“回阳救逆”、“扶阳却阴”之称谓。扶阳抑阴实属“寒者热之”的正治法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篇指出，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”，“凡阴阳之要，阳密乃固”，其义即强调阳气的重要性。后世医家从这些论点出发，在临床实践中有较多发挥。仲景毕生勤于辨证论治，创立扶阳抑阴之代表方剂与应用法则，提出对阴寒实证所致阳气大衰及迫阳于外所出现的阴盛格阳（戴阳）等垂危重证采取“急温”之救治方法，以起到救颠扶危的功效。观《伤寒论·少阴》篇载有“少阴病，脉沉者，急温之，宜四逆汤”（323条），如治阳虚烦躁之茯苓四逆汤证、阳虚水泛之真武汤证等，无不有此寓意，为后世开辟于扶阳抑阴之先河，至今仍被医家所重视，并有新的发展和突破。已故名老中医赵锡武对此颇为究诂，曾谓“治病有所主见，胸有成竹……有胆量，以扶阳救逆，

畅、开展、调达、宣散、流通等综合性生理功能，但此均系布阵、遣散之派生，与“罢极”之本意雷同。惜历代医家虽对“肾者，封藏之本”立“肾主封藏”之生理机能，而对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未立“肝主罢极”之能，而以较为通俗之“疏泄”代之。究其内涵，与其本意相同，且已公认，则似无更改之必要。诚

“扶阳抑阴”与“益火消阴”辨析

135000 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医院 马冠英

主题词 中医治法

抑制阴邪，常可在危笃之际化险为夷”。《赵锡武医疗经验》一书，对冠心病及以真武汤为主配用治水之法治疗充血性心衰等，均大胆运用此法收到明显效果。赵氏还强调，“我每每提倡用真武汤，就不怕附子量大，取其鼓动心阳，抑阴邪上乘”。综上可知，先圣后贤对此法的认识及其运用基本一致，而关键在于真正做到胸有成竹，临危不惧。只有准确无误辨治，才可使阳衰垂危之重证，令其化险为夷，趋入坦途。

二、益火消阴的概念

益火消阴，是指平素肾阳虚乏或肾阴虚损累及肾阳（阴损及阳或阴阳两虚）导致肾阳虚衰（命火不足）而形成虚寒证的一种治法。所谓“益火”，系指扶助命门之火（肾阳）以退却虚寒，以期阴阳平衡、水火既济之目的，故又称“补阳配阴”、“补水中之火”。益火消阴属“阴病治阳”之反治法，亦即“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”之简称，源于王冰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热之而寒者，取之阳，所谓求其属也”一语之注释。后世医家在王氏启迪下皆有所阐发。明·张景岳长于温补，尤其对精气两虚、补阳配阴之理然，肝主疏泄之性并不若“罢极之本”寓有“归藏”之性，仅能表达其遣散之情，是为不足，然有《素问·调经论》“肝藏血”之补填，也弥以大全矣。

（作者简介：潘文奎，男，56岁。早年学医，现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。）

颇有建树（自创右归饮、右归丸）。张氏探赜王氏奥蕴，并深有体会地说“热之而寒者，谓以辛热治寒而寒反甚”，意指虚寒证直接用辛热药治疗不但不见效，反而使寒证加重。究其原因，又阐释为“非寒有余乃真阳不足，阳不足则阴有余而为寒，故当取之阳，谓不宜攻寒也，但补水中之火则阳气复而寒自消”。综上所述，实寒证与虚寒证治法迥异，予治实寒之法以治虚寒，不但不能奏效，反而易犯虚虚之戒，使精气愈虚、病情加重。

三、体会

扶阳抑阴与益火消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前者适用于肾阳大衰的危急重证，宜速投刚燥温阳大剂，以直折其寒，后者应用于一般肾阳虚衰生寒的缓慢证，其肾阳虚所生之寒，非实寒之“寒”可比，且因其既阴衰，又虚寒，不同于阴寒内盛、阴盛格阳之证，故不宜单纯温阳刚燥。

选择代表方剂是区别二法的辨治关键。《伤寒论》之四逆汤类，一向被后人誉为扶阳抑阴之代表方剂。金匱肾气丸类，后世奉为益火消阴之典型方剂，此方以地黄为君，用量最重，意在补水，桂附二味用量较它药轻，旨在生肾气。

总之，扶阳抑阴与益火消阴二法有本质上的区别，临床运用根据不同的证候特点予以鉴别，可不难收到预期效果。

（作者简介：马冠英，男，43岁。1962年毕业于吉林省磐石县卫校，现任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医院主治医师。）